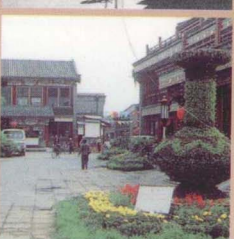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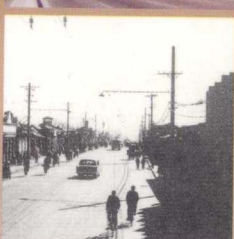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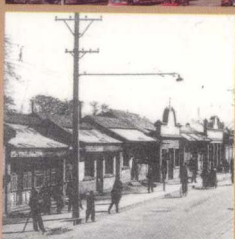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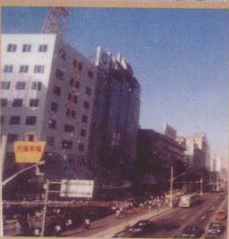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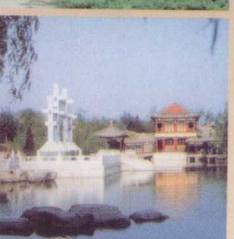
1949—1999

宣武文史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宣武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宣 武 文 史

第 八 辑

政协宣武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99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1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1200 工本费 15.00 元

(内部资料)

序

《宣武文史》第八辑今天出版和广大政协委员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宣武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向国庆五十周年献上的一束鲜花，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从1949年10月五星红旗在新中国升起始，宣武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使宣武区这片古老的土地，发生深刻的变化，摆脱了贫穷落后，实现了初步繁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全区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精神文明花朵更加艳丽芬芳。宣武区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志士仁人无限热爱宣武区这片沃土，和宣武区人民群众一道，为宣武的振兴洒下辛勤的汗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宣武人民精神振奋，宣武面貌日新月异！

《宣武文史》第八辑共收录了36篇文章，这些文章以翔实的史料，真实地再现了宣武区的历史面貌。出版这本文史专辑，目的是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宣武的昨天，以激发大家热爱宣武、发展宣武的热情。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宣武区委的领导下，以高昂的斗志和只争朝夕的精神投身到振兴宣武的各项事业中去！

向为支持《宣武文史》第八辑出版付出辛苦劳动的各位撰稿者和有关方面、有关人士致以衷心感谢。

政协宣武区第十届委员会主席 **郑文奇**

1999年7月1日

目 录

序	郑文奇 (1)
---------	---------

难忘的黎明

——忆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	刘向勃 (1)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制作	刘 萍 (5)
为共和国制印刻碑	刘一达 (7)
开国纪念章唤起的回忆	刘向勃 (13)

周恩来关心荣宝斋	侯 恺 (17)
朱德、董必武、彭真、朱镕基莅临	

北京印钞厂视察	王芳玖 (20)
---------------	----------

打倒天桥恶霸 人民笑逐颜开	白继增 (27)
政府一声令下 根除妓院娼妓	李金龙 (33)

宣武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孙兴亚 (50)
昔日荒凉南下洼 今朝小区楼林立	舒 了 (71)
北京第一个大礼堂换新颜	张 忠 (80)

宣武区商业在改革中发展	梁福金 (85)
京城黄金第一家	

——菜市口百货有限公司	马 晨 (93)
改革开放中的“天建”集团	范荫轩 (97)
辉煌的“十连冠”	

——天桥联社的发展历程	天 联 (109)
-------------------	-----------

张一元茶庄名扬九州	王丽华 (116)
南来顺饭庄生意兴隆	张富仁 韩信农 (119)
内联陞鞋店的新“履中备载”	刘锦涛 (124)
北京第一个妇女服装店	刘锦涛 (130)
从龙凤斋盖楼谈起	管 平 (133)
从个体户到光洁公司	高 洁 (139)
史光辉和他的肿瘤测定仪	史 仪 (146)
从天桥“大棚”到世界赛场夺魁	刘 荻 (153)
红楼文化植宣武	王清风 (162)
湖广会馆谱新篇	许立仁 (182)
继往开来的戏曲摇篮	刘松崑 (186)
今非昔比的宣武教育	宣教志 (207)
红旗业余大学四十年	张文登 (229)
前进中的北京十五中	时 悟 (240)
从延安走出来的育才学校	李振业 (245)
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京小学	陈玉华 (260)
千年礼拜寺再铸辉煌	哈吉·阿里·李德育 (273)
民族教育桃李香	林理炯 (289)
北京第一家回民医院	回 医 (306)
宣武区民主党派的成长	沈建平 (313)
记“红色资本家”乐松生	潘 怡 (320)
编后记	(335)

难忘的黎明

——忆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

刘 向 勃

五十年前的今天——1949年的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北平终于迎来了自己历史上的黎明，宣告解放；并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在全国的胜利，在这年的10月1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饱受国民党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早就透不过气来的北平人民，从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那天起，就在盼望着古城的早日解放。1949年1月21日清晨，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协议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城）外撤，沉寂多日的沙滩北大民主广场，人又多了起来。从早到晚前来打听人民解放军何时进城消息的群众络绎不绝，笔者也是当时其中的一个。

1月31日这天，广场的民主墙上依旧是前两天贴出的那几张被风吹破的陈旧海报，没有甚麽新的东西贴出来。冬日下午，只有稀稀拉拉地几拨人在红楼和灰楼间的广场上，边晒太阳边来回散步聊天。引人注意的是，这天广场上有两三位北大的同学簇拥着一位身着草绿军装的中年军官，仿佛在充当向导正向这位军官讲述着什么。这位身材修长犹如白面书生般的军官，给人突出的感觉是气质与国民党军官迥然不同。因而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许多年后他的面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接近中午的时候，广场西墙的木板门上贴出一张用白纸毛笔

书写墨迹未干的海报，上写：“人民解放军定于一月卅一日中午一时自西直门入城”。广场上散步的人，立即围拢聚集到海报前，喜悦和兴奋一同涌上心头，每个人默默地注视着海报上那短短的两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过了好久才仿佛有人如梦初醒说道：“时间不早该出发了！”人们顾不上考虑手里应该拿上些什么，（那时一般人家没有电话，街头也无公用电话设施）也来不及通知家人和知己好友，三三两两立即组合在一起，蹬上脚踏车出沙滩北大西门奔向西直门。

我们的自行车队到达厂桥时，远远看到西边平安里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已站满夹道欢迎的市民。随着前面传来的阵阵掌声，队伍已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在人民解放军队伍最前面引路的是位身着革面羊皮袍，五十开外，浓眉大眼红脸膛的农民。他昂首阔步，神气地走在马路的正中，两眼注视着前方，一手提着皮袍敞开的大襟，一手不住地胸前摆动，充满了骄傲和自豪。紧接着是几十人组成的手持鼓号及各式乐器的军乐队，吹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面是头戴皮帽，身着棉军服，腰扎皮带，膝下绑着高高裹腿，肩扛枪械成四行纵队前进的战士队列。每个战士黑红的脸上露出农民的质朴和淳厚，给人以亲切的子弟兵的感觉。

队伍从面前走过去了。欢迎的人们舍不得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刚刚相见就立即离去，原来站在路边欢迎的群众，顷刻间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为解放军中的一员，分享到革命的胜利和喜悦，纷纷紧跟在部队的后面，与解放军汇成一股铁流，踩着军乐的鼓点向前走去。队伍经过北海后门、地安门、宽街、铁狮子胡同（正好是今日的平安大道），出东口折而往南。这时，闻讯从古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各界群众，早已将东四牌楼北大街挤得水泄不通。

电车、自行车、三轮车、行人都就地停下来，店铺前、便道和马路上，整个街筒子挤满自动前来欢迎解放军的各界群众。有

的双手齐额鼓掌向解放军表示致敬，有的唱起《解放区的天》，有的从旁边的商店借来锣鼓，有的带头扭起秧歌。一位年纪六七十岁、头带黑缎子瓜皮帽、身着古铜色长袍、外罩黑马褂，士绅模样的老者，从路旁商店讨来一只白粉笔，求身旁的大学生在他的脊背和胸前各书写了“天亮了”三个大字。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挤进人流随在年轻人的后面举手投足，象个天真的孩子舞了起来。事后听说，聚集在这里欢迎的群众，直到深夜才渐渐离去。

解放军队伍由于接防任务在身，不便在此停留，经东四牌楼向东直奔朝阳门城楼而去。事过若干年后，得知这支最早入城的部队是在东北战场上战功显赫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的人民解放军41军。1月31日这天，这个军先行开进北平一个师，分别从国民党守城部队手中正式接管过西直门、德胜门、朝阳门、复兴门的防务，其余两个师在次日也开进城里。

三天以后，为了庆祝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欢庆北平回到人民的怀抱，于2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上午10时，在前门箭楼，随着四颗照明弹升上天空，北平入城式开始。受检的人民解放军的装甲车、坦克、炮车和汽车部队，由永定门进城，经前门大街、箭楼，穿过东交民巷、东单、东四、地安门、西四、西单、宣武门，到广安门出城，直到下午五时方才结束。看到人民解放军已拥有了这些现代装备，北平人民对解放全中国更加充满了信心。

这里必须提上一笔。从方亭同志写的《难忘的战斗岁月——关于北平地下电台的回忆片段》一文得知，人民解放军“1月31日中午1点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这一通知，是当时北平城工部的负责人刘仁同志于1月29日从城外用电报打给北平地下电台的。这个英雄的电台在抄收完这份电报的第二天即奉命“停止联络”，结束了它在北平两年多的艰辛的战斗历程，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历史使命。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以在全国取得伟大的

胜利，这些忍辱负重默默地而又是轰轰烈烈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勇士们，同样是功不可没。

本文前面提到的，半个世纪前我在北大广场上见到的那位身着军装气质不凡的军官，解放后有几次机会曾又遇见。如果我没认错，他应该是部队作家刘白羽同志。果是如此，他应是解放区作家中最早进入北平的一位，当书上一笔。可惜无人引见，我一直无法与他核实，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还存疑在心里。但愿借本文发表机会，能以得到确切的答案，将是一大快事。

作者简介：刘向勃，农业部离休干部。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制作

刘 萍

每当你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会不会想知道，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样制做出来的？国庆节前夕，原高熔金属材料厂副厂长、离休干部宋树信向笔者讲述了这段往事。

宋老虽年纪大了，可提起往事，仍是满脸兴奋的神情，他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党派我到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工作，9月下旬，政协一届会议确定了国旗、国都、国歌，并决定于10月1日在北京飘扬起数万面红旗。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根据当时的条件，我们决定用红布做旗面，黄布做五星，用缝纫机缝制。”

“9月29日上午，经理又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一面长5米多宽3米多的特大号五星红旗。红旗质量要好，五颗星必须用缎子做。当时我又激动又紧张，党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可距开国大典只有两天的时间，任务完成不好砸了锅怎么办？我顾不上多想，先在公司里找到做旗面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的白布，就是找不到做五星的黄缎子，我骑车跑遍了市里所有的布店，整整一天都没有找到。急得我火烧火燎，夜不成寐，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了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一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翻翻库存。他们一听事关重大，找了几个人一齐去找。两小时后，交给了我一卷三米多长的黄缎子。我抱上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

我把布交给他们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市尺多宽，做最大的五星根本不够宽。经上级同意，我们在大五星的一个角接一个尖，拼接后，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我们连夜赶制了相同的两面五星红旗。”

“10月1日，一早，我把国旗送到设在天安门城楼北侧西面的开国大典筹备处。一位50多岁，操着南方口音的同志笑着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同志，你是党员吗？”我忙说：“是。”他说：“你为党立了一功呀！”我当时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事后才知道，那位同志就是当时北平市的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同志。”

说到这里，宋老的眼神中充满了自豪。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10月1日下午3点，30万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我也站在队伍中。当毛主席亲自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全场沸腾。我的视线全被泪水挡住了……”

（注：此文摘自1990年10月23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为共和国制印刻碑

刘 一 达

[按] 坐落在宣武区东琉璃厂的萃文阁，有十几位书法、篆刻的老艺人，当年他们为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刻下铭文，为和平解放后的北京刻出大批公章，如今他们又与四通联合开发了电脑刻章系统。《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经过走访，记述下了这些有意义的史料，今天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将这篇文章编进这本专辑，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事情，并永远记住这些曾经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共和国做出过贡献的老艺人们。

制印几万枚·老艺人立功

今年是北京和平解放 50 周年。50 年前，解放大军进入北京城，和平接管了旧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在北京建都，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和国务院政府机构陆续迁到北京。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当时面临的一件大事就是制印，用大白话说就是刻制公章。印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政权的象征，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重新制印，您琢磨一下，这是多么大的一项“工程”，当时这些印章是怎么刻出来的呢？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印章艺术公司的十几位老师傅，请他们回忆了这一段有意义的史话。

老北京刻字的手艺人，一类是专刻书版的，以前印刷业落后，

木版印刷均需刻版高手来刻字，铅印法发明以后，这类手艺人渐渐改行。一些人改刻名章，即在木头、牛角、象牙上，用楷书、隶书、篆书等字体；另一些人改刻公章，用宋体，仿宋体，材料主要是杜梨木、牛角。还有一类属于艺术印章，即把所刻的名章或书画上的用章艺术化了。这类制印高手有的本身就是书画家，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书画家自己制印刻章始于元末明初画家王冕，以后许多书画家也经常是自己制印。这类印章的刻制就是我们常说的篆刻。老北京专门经营制印业务的刻字店并不多，有名的如琉璃厂的萃文阁、同古堂、七弦馆、印痕楼、鸿雪馆和老东安市场的“八大家”等，到北京和平解放前，专门刻字的店铺寥寥无几，其艺人们也都散落民间，有的挂笔单也有的做行活。萃文阁的书法篆刻专营店却保留了下来。解放军进城后，中央人民政府急需刻大量的公章。怎么把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刻字匠组织起来呢？这在当时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

今年 67 岁、原印章艺术公司党委书记刘志亭回忆说：“当时北京刚解放，老百姓的心气儿都很高。我记得组织刻章的是进城部队，后来由总政和总参负责，刻字匠们本来没有组织，几乎都是独立经营，但听说要给新生的政权刻章，都觉得很光荣。当然，那会儿找刻字匠也是有所选择的。很快就组织了十几个人，专门刻章、制印，对外称生产小组，我们租了几间房，由部队看守。刻图章，属保密单位，刻出的章由部队战士统一拿走。

70 多岁的范玉贵师傅是刻木章的高手，他回忆说：“当时刻章用的是杜梨木和黄杨木。生产小组最早在清河，后来搬到杨梅竹斜街的皈子庙。我们的积极性都很高，刻得也非常认真。”这个生产小组就是现在北京市印章艺术公司的前身，除了刻木头图章，他们也做铜章。解放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政府机构以及驻外使馆的印章几乎都是由他们刻的，他们还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刻过章。

范师傅说：“由于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印章也统一由我们来刻。解放初期，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等政治运动不断，我们的刻字生产小组刻活也一直没有间断。西藏和平解放后，从自治区政府到下面的基层政权都要刻公章，上面是汉文下面是藏文，要是全部用木头刻，一年也刻不完。于是我们采用了新技术，用电解铜制模具，几千枚公章刻了几个月才完成任务。”这些刻字师傅在北京和平解放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先后刻了几十万枚公章。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字·篆刻师巧用放大样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大庆。为了迎接这一盛典，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要进行全面维修。纪念碑的正面碑文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背面的碑文由周恩来总理书写。正面碑文每个字有两米见方，您知道它是怎么刻上去的吗？说起来，这也有京城刻字工艺师们的功劳。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 1958 年 4 月 22 日落成的。落成之前，毛主席书写了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毛主席的碑文是写在“八行书”的宣纸上的，每个字有核桃大小，周总理的碑文也是写在宣纸上，每个字有铜钱大小，怎么把写在宣纸上的字刻到碑上去呢？当时的建筑师们想到了过去字号写匾时用的放大样的方法，老北京刻字刻匾比较有名的是萃文阁，于是这个任务就由萃文阁等单位承担了。

今年 83 岁的徐焕荣（笔名柏涛）对记者回忆说：“当时的萃文阁还没公私合营，属私人企业（后来归属市印章艺术公司），经理是魏长青，魏长青在京城印章业有一定名望，是我的师傅，他接到这个任务非常激动，带着我和另一个徒弟李文新，一起研究如何放大样。当时纪念碑的工程指挥部在棋盘街，说是指挥部其

实就是临时搭的一个大棚，我们到了那儿就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所谓放大样，就是用‘九宫格’把毛主席写在宣纸上的碑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拆开描出来，然后用幻灯片把字打在墙上，笔道的线条从哪儿划，从哪儿勾，都如实描下来，印成照片，然后再反复比较和分辨。最后把放大的碑文按原来的墨迹刻上胶模粘到碑上。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星期。”

刻碑是很复杂的活儿。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整块的花岗石，里面有石英石的成分。按传统的做法，是拿錾子把字圈出来，然后把笔道剔出来，再拿小刀刮，因为花岗石有石英石，硬度有7度，拿錾子一剔就崩，而纪念碑的要求极严，不能有一点斑点和毛茬，刻碑的石匠没了辙。只好找刻字社来帮助。据印章艺术公司的工艺师郑怀忠回忆：“当时刻字社的师傅们琢磨了几天，最后采用刻水晶石的喷沙法，才把这个难题解决。”

工美老艺人榜上有名·驻华大使要见篆刻师

北京市印章艺术公司集中了一批高级工艺美术师和篆刻大师。如徐焕荣（柏涛）、李文新、砚波、陈硕、韩宝玉、刘铁宝、吕品等在社会上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1958年，京城首次评选工艺美术老艺人，在当选的10几位中，印章业的魏长青、陈漱石、徐焕荣榜上有名。

不久前，远在美国的张学良先生过生日，柏涛先生托张学良先生的侄子带去了他写的条幅：乐寿康宁。张学良先生对柏涛的书法津津乐道。徐焕荣先生15岁进萃文阁拜魏长青为师，一直从事篆刻书法艺术。他雕刻的一对田黄石印章龙纽《十龙图》被故宫博物院作为珍品收藏，他用寿山石刻的《万古留芳》成为毛主席纪念堂的藏品。柏涛先生在50年代曾经给斯大林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刻过印章。

在京城印章业，除了像柏涛和李文新这样的篆刻书法闻名的大师外，还有不少刻铜行家。京城许多建筑物如人民大会堂、农展馆等门上的铜饰都出自这些技师之手。孙万锁技师就是其中一位。各国驻华大使馆的公章都是由印章艺术公司刻，大使馆的公章除了本国的文字外，图章的中间还要刻上本国的国徽，这些国徽都是手绘然后再用刻刀刻的，孙师傅先用铅笔一点一点勾，再用毛笔描，反到胶皮上刻，刻出来的非常逼真，令各国大使馆的官员叹为观止。他在给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馆的印章刻好后，大使非要亲自接见他。

压塑鞋底受启发·以塑代木见奇效

以前，刻公章一般分为木制和铜制，木制印章比较流行，木料取自东北产的杜梨木。这种木料筋少纹细。北京市印章艺术公司每年光刻公章就得用几十万斤杜梨木。“文革”后期，所有单位都要重新换印章，这些印章统一由印章公司刻。印章公司的刻字师傅们算了算，这几十万枚公章，全公司职工就是日夜加班连轴转，都刻出来也要用10年以上工夫，怎么办呢？

一向喜欢在篆刻艺术上开拓的京城刻字师傅为此动了脑子，李光鼎老师傅从塑料底布鞋上刻的图案受到了启发。能不能把木头图章改为塑料图章呢？李师傅和刘志亭、郑荣生、郑纯吉等一起研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制成了塑料图章的坯子，这实在是印章材料上的一次革命，很快更换的印章全都采用了塑料的，过去刻木头图章，一个职工一天最多能刻4枚，现在刻塑料图章最多能刻40枚。只用了两年多，各单位的公章就更换完了。

电脑取代手写·印章业发生革命

印章技术的真正革命是近二年的事。当印刷业告别铅与火的年代之时，刻字业也进入了电脑时代。从80年代末电脑植字技术的出现到现在激光雕刻和“三维”技术的应用，印章业发生了质的飞跃。

印章艺术公司经理张宝平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刻公章已经使用电脑了。我们和“四通”联合开发出电脑印章排版软件，对印章业说又是一次革命。原来刻公章，主要靠写字工人用手写，一个高级写字师一天最多写900多个字，一般的工人只能写六七百个字。公章上的字都是规规矩矩的仿宋体，写起来很吃功夫。1972年，我们专门从学校招了15个写字工，培养了3年，最后只剩下3个人了。多年来，培养写字工是个难题。现在这一问题已迎刃而解。

不过，高科技引入印章业，对中国传统的印章工艺是一个冲击，对印章艺术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也带来了挑战。目前，一台激光雕刻机需三四万元，相当于过去的一个小刻字社，由于印章业在管理体制上存在一些问题，加上一些无照经营私刻公章的现象已成为社会暗流，这些都不利于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印章业的发展，由此看来，印章业在向高新技术迈进的同时，其管理也应走向科学化和法制化。

作者简介：刘一达，《北京晚报》记者。